

2013年1月8日 星期二
责任编辑:黑寅升 电话:6207156
版面设计:陈 艳 校对:陈亚莉

于幼军谈当年被撤职后生活

图书馆可助人疗伤治病



2009年春节前,于幼军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读书、写作。他将自己在此读书写作的小房间称为“文德书房”。(李昭淳 摄)

古今中外,多少哲人贤达盛赞图书馆:集古今一切圣贤遗产之大成,是人类一切精神财富的宝殿,是思想的疗养院、精神的粮仓、人生的驿站和加油站,云云。多少有识之士从自己和他人的经历中,认识到读书是一种享受,是一种生活方式;读书能陶冶性情,涵养浩然之气,使人充实、明智、灵秀,周密、精邃、庄重、思辨,等等。

四年多前,我经历了一场人生沉浮起落,从中深切感悟读书和图书馆还有一大功用——疗伤治病。图书馆能够帮助人们抚平心灵创伤,摆脱精神困境。

受到撤职处分后,我过上了“文学与出汗”加清茶淡饭的生活

2007年9月,我从山西省调到文化部工作。次月,参加中共十七大后,连续3个多月率队到文化部下属10多个单位和11个省、市、自治区调研,形成了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,加快推进文化体制改革,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的工作思路和对策措施。

我执笔整理调研成果拟出调研报告,经文化部党组、部长办公会议多次讨论达成共识,报党中央分管领导和中宣部同意后,主持召开了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,做动员部署。

正当我全身心投入新的工作,准备大干一场之际,突来晴天霹雳,先是被接受调查,半年后被撤职处分。

受处分后,我面对现实,在反求诸己、痛定思痛之际,反复告诫自己:“败走麦城”,身陷逆境也是人生大熔炉。运交华盖,遭受挫折,理想信念不能变,精神身体不能垮,不虚度宝贵光阴,不白领人民俸禄,利用赋闲待业之机,读书写作去也。

2008年10月,受处分后十来天,我安慰、安顿好80岁高龄的老

母亲,来到位于北京紫竹园畔的中国国家图书馆。

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负责同志商量,在行政办公楼二楼安排了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房间,配上了书桌、书柜和一张床,供我读书写作。几个月后,又搬到五楼一间十来平方米的房间,在此开始了赋闲待业的读书生活。

我每天上午八点多抵达这间“紫竹书房”,读书、做笔记摘录至中午十二点多,在图书馆里的员工食堂打点饭菜,吃完休息个把小时,下午继续读书至六点多离馆。

回家后自己动手煮碗荞麦面、豆面之类,打上两个鸡蛋或丢进一根广东腊肠,前后十来分钟连煮带吃就对付过去了。

周末、节假日图书馆的员工食堂不开伙,我就到附近的“庆丰包子铺”,买上二两肉包子或饺子,就着茶水吃下去。

后来,中国国家图书馆新开了一间为读者服务的“品诺咖啡店”,每逢周末、节假日读书饿了,就到那里花18元叫上一份“碟头饭”,外加10元的素菜汤,倒也津津有味,比吃包子改善多了。

晚上我则去散步、游泳或打球,过上了“文学与出汗”(借用鲁迅一篇杂文的题目)加清茶淡饭的生活。虽孤寂清苦,却也乐在其中。

每天读书不辍,渐渐,书读进去,人走了出来。

与好友曹淳亮见最后一面。在广州陪伴年迈的母亲并潜心读书

过了两个多月读书郎的生活。一天忽闻挚友——广东省文化厅长曹淳亮病危的消息,次日即乘飞机回广州。下了飞机直接赶去医院,总算与相识30多年的好友见了最后一面。

那天淳亮可能是回光返照,神志尚清醒,可以轻声说话,我们聊了近1个小时,没想到第二天他即

驾鹤西去了。

在亡友的告别仪式上,我见到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馆长李昭淳,对他说:“我母亲最近的心情和身体不好,我想在广州住一段时间陪陪她老人家。家里来访的朋友客人络绎不绝,你可否在中山图书馆给我找一处安静的地方,放得下一张书桌即可,供我白天躲在那里读书?”

李昭淳二话不说,当即爽快应诺。

第二天(12月30日)上午,我到了位于文德路的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分馆。步入馆内,但见古树参天,林木荫蔽,全无大都市的喧闹尘嚣。楼、院面积均不大,却历史悠久,可谓是广州的文脉之地。

北宋绍圣年间,即在此地点建起了学宫,此后数百年屡废屡建,至明代为广府学官御书阁,距今已有800多年历史。

馆内番山亭前一副对联,道出了此地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:“崇广府千年道统,接学宫一脉书香。”真乃大都市潜心读书的一方绿洲、一块净土。

李昭淳把我带到善本书库,让我看一册新近入藏、已有800年历史的镇馆之宝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。该善本刻本与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、金代山西民间集资刻印、曾长期收藏在山西赵城广胜寺的《赵城金藏》年代相近,堪称国宝。

接着,李昭淳又把我引至二楼东南角一约10平方米的房间,已摆放好了书桌、书柜、沙发等,窗明几净,阳光明媚。我谢过了李昭淳等人,当天就在那里开始了读书生活。

每天到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读书写作,元旦春节也不曾例外

过了多日,我才了解到,旁边几位馆长的办公室均只有10平方米左右,给我使用的这一间光线最好。这原是一位副馆长的办公室,他临时腾出来让我用。

细心的李昭淳担心我整天埋头读书太累、太闷,隔三岔五来与我聊会历史、宗教,送上帮我查找的图书资料,还嘱咐在我“书房”旁边的毛凌云副馆长和张喜年博士等人,协助我及时查找和复印资料,使我得以专心、顺利地读书和写作。

我像往常上下班那样,每天上下午都准时来到这间“文德书房”读书、写作,元旦、春节、节假日也不例外。以至于李昭淳和我开玩笑:“你元旦、春节每天都来馆里‘值班’,我们应该给你发‘加班费’。”

我笑答:“我也没有给你们交房租,扯平了。”

这里十分安静,且没有人知道我在此读书。除黄崧华、刘斯奋、赵军、张文可数几位老领导、老朋友恰巧碰上了,与我促膝交谈一番,基本无人打扰。

这段时间我的读书效率较高,两个多月时间,除读完十多本书,阅读、复印了一百多万字的资料,还拟出了五六万字的《社会主义在中国》一书的写作提纲。该书是《社

会主义五百年》的第三卷。

二十多年前,我与年轻时的伙伴黎元江合著《社会主义四百年》时,就常常来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查找和借阅图书资料。

我至今还记得,在写作第二卷时,我曾委托李昭淳帮助查找苏联“肃反”、“大清洗”时基洛夫被刺这一关键事件的有关史料。他在本馆找不到,就专门致函联系请国内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、华东师范大学的沈志华教授帮忙查找。

可以说,前后相隔二十多年写作《社会主义五百年》一、二、三卷,让我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结了缘。

完成《社会主义在中国》等书稿后,接通知到新工作单位报到

2009年3月10日,我离开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回到北京,又一头扎进中国国家图书馆的“紫竹书房”,继续过着“文学与出汗”加清茶淡饭的生活,并开始了《社会主义在中国》一书的写作。

这时已从文化部调任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的周和平和其他馆领导,热情地为我的写作和生活提供细致周到的服务,安排馆内决策咨询部的王海燕主任和咨询员张曙光博士,协助我查找、复印图书资料。

我每每开出图书资料清单,她们很快就送到我的手上。有时,我也直接到书库去查找图书资料,后楼走到前楼非常方便。

爬格子手写的书稿出来了,文化部文印室和国家图书馆的几位打字员轮流帮助我打印出来,使我节省了许多时间。

每隔一两个月读书写作累了,我便拿出十天左右的时间,到中国近、现代史重大事件发生地、重要人物活动的地方和革命老区去实地考察、收集资料,请教当地革命老前辈和专家学者。

我先后跑了江西、福建、陕西、宁夏、甘肃、上海等10来个省区市,收获甚丰,为构思写作奠定了基础。

如此春去秋来,我阅读了三四千万字的图书资料,复印了几百万字的资料,写下了上百万字的读书笔记及资料摘录,书桌上的书稿也越摞越厚。

经一年半努力,我完成了《社会主义五百年》第三卷《社会主义在中国》的初稿,又着手把一二十年前与友人合著的第一、二卷中由我负责“切块包干”写作的部分进行修订。

我重新阅读了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宁、普列汉诺夫、斯大林和布哈林等人的主要著作,阅读、吸收了国内一批专家学者近二十多年研究的新成果,收集整理了一批国内外的新史料,对原著进行了大幅度修订,增补了许多新史料、新论述、新感悟,每卷各增写了10万字左右。

终于,在2010年12月25日,我校对完毕并签发了送往出版社的一、二、三卷全部书稿清样,总算做完了一件事情,顿觉如释重负。

非常凑巧的是,那天上午,我刚托人把书稿送出,下午就接到中

组部负责人的电话,通知我下周到新工作单位报到。也许是苍天有意给我两年多的时间读书写作,一旦我完成了书稿,连一天也不让我休息。

出书后忐忑不安地观察学界的反应,感恩中山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

2011年5月,《社会主义五百年》一、二、三卷出版面市。我怀着丑媳妇见公婆的心情,忐忑不安地观察学术界和市场的反应,等待着读者的审判。

所幸的是,该书出版半年多的时间里,《人民日报》、《光明日报》、《学习时报》、《南方日报》、《羊城晚报》、《深圳特区报》和《科学社会主义》、《中国改革》、《学术研究》、《粤海风》等国内几十家报纸杂志纷纷发表了书讯和书评文章,或连续数月选载了其中若干章回。

国内几大网站也发表了书讯、书评或连载,数万网民在微薄、跟帖上发表了令我心暖、心动的话语,其中也有几段不同意我书中的一些观点。

几十位热心读者给我来信,在对拙著肯定、赞扬的同时,指出了书中若干需勘误之处。

许多革命老前辈及其后人、著名的专家学者给我来电来函,赞同我秉持的“对历史负责、对人民负责、对自己良知负责”的写作态度及书中对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,热情鼓励我要继续写下去。

中宣部领导同志肯定我做了一件很有意义、很有价值的事情。

国家出版总署柳斌杰署长读完全书后对我说,你这部书在国内出版物中创了两个第一:以五百年的历史大视野,把世界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的源起及艰辛曲折梳理清楚并说清楚,在国内出版物是第一;以文学的体裁、文学的笔调写作严肃的政治理论和重大的历史题材,在国内出版物是第一。

这一切,将成为我人生的宝贵财富,给了我今后学习、思考、研究和写作的启迪及动力!

该书出版一年已三次印刷,第一、二卷发行了各十多万册,第三卷则发行了二十万册。《社会主义在中国》入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组织评选的“经典中国”国际出版工程2012年资助出版项目,将被翻译为英文版在世界发行。

我在感恩社会、感恩读者的同时,自然会感恩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和中国国家图书馆,因为这本书是在这两个图书馆怀胎十月呱呱落地的。

更重要的是,这两年多在图书馆的读书生活,使我得以冷静下来,全面反思我们党和国家走过的道路,当今中国的社会信仰和道德建设的状况、当下种种令人喜忧参半的经济社会现实问题等,系统清理了自己的思想,想得很多很多……

——本文应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建馆100周年征文活动约稿而写。

(作者为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。本文小标题为编者所加)

(据《羊城晚报》)